

#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述评

孟文婷

**内容提要**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与中国军事外交的拓展、中国对维和事务的参与度密切相关。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维和的态度发生转变,从不参与到有限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一时期学界着重分析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21世纪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形式逐渐多样,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与原因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和分析的重点;最近几年,中国成为支持联合国维和的中坚力量,学者们开始讨论维和的中国方案,建立“中国维和学”的呼声愈发高涨,这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总体来讲,中外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偏重政策性,而维和实践层面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此,需要中外学者采用过程追踪和访谈等方法,与中国从事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开展广泛交流。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联合国 维和行动 中国维和研究

---

\* 孟文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 笔者特别感谢王逸舟教授、李东燕研究员、张贵洪教授、何银副教授、薛磊助理研究员提出的宝贵指导,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与编辑部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本文是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经验、问题与思考”(项目号为16AZD03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自1989年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维和行动开始,从有限参与到积极参与,再到现在成为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坚力量,经历了很大变化。国内外学者敏锐捕捉到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动态,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一系列研究。回顾和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去粗取精,将为推进中国的维和研究奠定基础。

## 一、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发展

中外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与中国军事外交的拓展、中国对维和事务的参与度密切相关。回顾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过程,从安理会维和提案上的“第五种投票”<sup>①</sup>到开始投赞成票,从不参与到承担维和摊款、派遣维和人员,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变。每个阶段都涌现出一些研究机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重点也是围绕这三次重大转变展开的。

### (一) 中国从不支持到有限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20世纪80—90年代)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国带领的“联合国军”多次发生交锋,中国曾一度把联合国维和行动看作霸权主义的工具。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国际社会逐渐有了新认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也发生转变。1981年,中国投票支持安理会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UNFICYP)驻扎期限的决议,首次宣告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并从1982年开始承担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摊款。1988—1998年,中国在安理会投票支持建立36个维和行动,其中有传统维和行动也有多维维和任务,但是,中国对武力使用原则(use of force)和强制维和(peace enforcement)<sup>②</sup>任务一直持保留态度。1989年11月,中国向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期援助团派遣20名文职选举监督员,参

---

<sup>①</sup> 联合国安理会通常有四种投票形式:赞成、反对、弃权、缺席和拒绝参加投票。然而,中国在1971—1980年间,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过程,但不参与投票。参见朱雨晨:《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初》,《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5期,第28页。

<sup>②</sup>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戴尔将“和平行动”分为:传统的和平行动、强制的和平行动、缔造和平以及和平观察团。参见〔美〕保罗·戴尔和丹尼尔·德鲁克曼:《和平行动的评价》,聂军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与帮助纳米比亚实现从南非的独立。次年4月,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UNTSO)派遣五名军事观察员,这是中国首次派军事人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派出维和人员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1992—1993年,中国向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UNTAC)派出800人的工程兵部队,并提供了财力支持。

这一时期,学者尝试找到中国从不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转变为有限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在对中参与国际体系或国际机制问题的研究会涉及此类问题,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埃克诺米、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克森伯格主编的《中国参与世界》、<sup>①</sup>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江忆恩的《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若干思考》<sup>②</sup>等作品在论述中国参与国际安全机制时,都提到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内容。麻省理工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傅泰林、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庞中英是较早专门关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的学者,后来仍然有研究者尝试用其他理论解释中国态度改变的原因。<sup>③</sup>

## (二) 中国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2000—2013年)

2000年初,中国首次向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TAET)派遣民事警察,标志着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进入新时代。一些学者认为,鉴于这项维和行动的宗旨是建立联合国领导的过渡政权,由联合国在一个过渡期内履行东帝汶政府职能,这与国家主权与不干涉原则形成根本冲突,支持和参加这项任务表明中国在不干涉原则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sup>④</sup>2004年,中国支持安理会1542号决议,建立联合国海地稳定团(MINUSTAH),并派出一支125人的维和警察防暴队和五名维和警察单警,这是中国第一次向未与中国建交的

① [美]伊莉莎白·埃克诺米、迈克尔·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华宏勋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美]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4—10页。

③ Taylor Fravel,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ince 1989," *Asian Survey*, Vol.36, No.11, 1996, p. 1116; Zhongying Pang, "China's Changing Attitude to UN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12, No.1, Spring 2005, pp. 87-104; 冯继承:《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外交评论》2012年第1期。

④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Asia Report*, No.166, 2009, p. 6.

国家派出维和人员,也是中国首次派遣建制维和警察分队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防暴队有较强的武力行动能力,根据联合国的要求携带轻型武器等各种防爆装备,这也反映出中国在武力使用原则上态度有所松动。自此之后,中国在安理会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给予了更多政治支持。

在人力和财力支持方面,2003年,中国派出包括工兵和医疗的后勤保障分队在内共218人参加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MONUC),非作战保障分队后来就成为中国派出维和力量的主要方式。<sup>①</sup>2007年,经过积极斡旋和协商,中国成为首批被允许进入达尔富尔地区执行维和任务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对维和预算的捐款数额逐渐攀升,到2009年,中国对维和费用的摊款占比已经超过3%。<sup>②</sup>在培训交流机制方面,2000年成立的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和2009年成立的中国国防部维和中心,标志着中国维和培训和派遣前强化集训的正规化和规范化。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事务的一系列大动作,受到国内外学界、智库、政策机构的广泛关注,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评估和解释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行为。2007—2009年,瑞典的安全与发展研究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与安全研究所、美国的国际危机组织发布三篇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情况的全面评估报告,<sup>③</sup>从不同视角观察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挑战和前景。2011年,维和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国际维和》期刊发表题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刊,收录八篇文章,该系列文章后来集结成书。<sup>④</sup>其中,香港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冯康云(Courtney Richardson,后更名为Courtney Fung)和新西兰梅西大学防御与安全研究中心高级讲师马克·兰泰尼(Marc Lanteigne)都是长期关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的学者。

中国第一部专门讨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的学术著作是中共中

---

<sup>①</sup> Yin He, “China’s Changing Policy o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sia Paper*, Stockholm: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2007, p. 32.

<sup>②</sup> 参见联合国大会文件A/64/220/Add.1,2009年12月31日,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A/64/220/ADD.1,2017-08-10。

<sup>③</sup> 这三个报告是: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Yin He, “China’s Changing Policy o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SIPRI Policy Paper 25*, November 2009, Stockhol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up>④</sup> Marc Lanteigne and Miwa Hirono, eds., *China’s Evolving Approach to Peacekeep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中央党校副教授赵磊的《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实践：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研究》，<sup>①</sup>该书通过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类型、地域、人员、财政等要素分析，说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履行大国责任、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在安全与发展领域形成良性互动、互利共赢的局面。此外，赵磊和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副教授高心满主编的《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前沿问题》<sup>②</sup>一书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阐述最为全面的著作。

除上述作品外，国内外学术期刊上也有相关研究成果，这些文章总结和分折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程、特点、挑战和前景等，其中大量文章都在尝试分析中国政府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与原因。

### （三）中国成为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坚力量（2013 年以来）

2013 年，中国向联合国马里稳定团（MINUSMA）区派出一支 135 人的安全部队，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在维和行动中执行武装任务。2014 年，中国向联合国南苏丹派团（UNMISS）派出 700 人成建制的维和步兵营，这是中国对武力使用原则的再一次突破。2015 年 9 月，在联合国维和峰会上，习近平宣布成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现在已经进入第二年度的运营），建立 8000 人维和待命部队。2017 年 6 月，中国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在喀土穆部署到位。目前，中国派兵人数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维和摊款份额高达 10.2%，位居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的文章更多在讨论中国对联合国、对维和机制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提炼出“中国维和模式”或者“中国和平理念”。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副教授何银等学者认为，中国为维和贡献了“发展和平”的规范，呼吁中国在维和事务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sup>③</sup>与此同时，国防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两本研究维和的著

---

① 赵磊：《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实践：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0 年版。

② 赵磊等主编：《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前沿问题》，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1 年版。

③ 何银：《联合国维和事务与中国维和话语权建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11 期，第 40—61 页。

作:《国际维和学》和《新中国军事外交与国际维和研究》,<sup>①</sup>里面涉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战略思考,提出维和外交是中国军事外交的主旋律。

## 二、关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的重点与热点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短期内取得快速发展,引发研究者关注,对其进行不同理论层次的定位。从国际层面来看,有学者认为,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扩大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形式,<sup>②</sup>是有效参与全球公共产品和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示范。<sup>③</sup>从中国外交层面看,有学者认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体现,<sup>④</sup>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一种“创造性介入”。<sup>⑤</sup>

关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有三个热点议题:中国对维和态度的变化、中国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中国对维和机制的影响,这三个问题与前文提到的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三次重大转变有关系。

### (一)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变化:主权原则还是武力干涉?

国际维和机制始于1948年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UNTSO),大部分学者都认同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将“联合国军”看作是帝国主义的警察部队,因此,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持“谴责批判”的态度;70年代,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仍有提防,采取“冷静观察”的态度;80年代,中国政府逐渐认同维和作用,“有限参与”维和;90年代至今,中国在维和行动中逐渐扮演重要角色,是“深入参与”期。<sup>⑥</sup>

---

① 陆建新等:《国际维和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杜农一等:《新中国军事外交与国际维和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 李东燕:《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51页;李彤、彭博:《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3期,第69页。

③ 吴志成、李金潼:《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视角与实践》,《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1页。

④ 庞森:《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多边外交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44页。

⑤ 王逸舟:《中国维和应“创造性介入”》,《中国报道》2010年第2期,第59页。

⑥ 几乎所有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文献都会提到这四个阶段,参见赵磊等主编:《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前沿问题》;张慧玉:《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述评》,《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2期,第51—57页等。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从“坚决反对”到“有限认同”的态度变化有两个重要基础:一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认识发生改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从意识形态对抗转变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安全利益由重点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强调经济建设和政治安全并重,<sup>①</sup>希望积极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促进内部发展,安全重点的转移增大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意愿;二是摆脱国际孤立的特殊时期。<sup>②</sup>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对维和的支持态度,包括对像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阶段(UNOSOM II)那样比较激进的维和行动的支持,主要是为摆脱国际孤立的局面而做出的灵活调整,目的是继续改革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正因为如此,中国开始承认联合国维和的原则和理念。有学者从建构主义视角解释中国态度的变化,认为中国逐渐参与和学习联合国维和机制,这个过程也让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有了新认识,并建构中国在维和机制中的新身份,而新身份又进一步影响中国参与维和的实践。<sup>③</sup>

维和行动是基于国际正义与合法性的集体安全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国际干涉行为。中国对维和态度的改变,反映出其对主权概念的新解读。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逸舟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坚守主权命题当代有效性的同时,也要看到新的主权观应当超越旧式的纯粹法理的层面,以更加丰富的层次、更加多样的内涵和更具动态感的形态,给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新角色以更好的理论及政策说明。比如说,主权范畴出现了“层化”趋势,人们更注意到主权、使用权与管辖权之间人们的不同效用;更重要的,还是将主权观念放在一种全面的人权观之下加以透视。<sup>④</sup> 对主权观的充实与完善,为创新中国的不干涉主义提供重要基础,为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合法性的

① 聂军:《关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识》,《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20页;赵磊:《中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态度》,《外交评论》2006年第4期,第80—86页;周琦、张建岗:《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认知的改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第56—60页。

② Jing Chen, “Explaining the Change in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N Peacekeeping: A Norm Chang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8, No.58, January 2009, pp. 157-173.

③ 冯继承:《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

④ 王逸舟:《主权范畴在思考》,《欧洲》2000年第6期,第9页;Jing-dong Yuan, “Multilateral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Chinese View o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Vol.49, No.2 January 1998, p. 282.

解释。

国外学者也敏感地洞察到中国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问题上对主权原则的态度变化。中国政府一直坚守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提出的维和三原则:公正、当事国同意,以及非自卫或安理会授权不使用武力。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前主任季北慈认为,中国对主权原则的坚持表现在坚决尊重当事国意愿问题上,比如,2008年,中国以违反东道国意愿为由反对安理会向缅甸进行干涉。不过,中国对支持人道主义救助的任务持积极态度,比如,1992年,中国向柬埔寨派出工程兵大队帮助当地国家建设,还有2000年向东帝汶、2003年向刚果(金)和利比里亚派出维和人员都属于人道主义支持。<sup>①</sup>这种对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认同,促使中国在绝对主权至上原则方面的松动。

在干预形式上,中国对武力使用和强制维和一直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傅泰林助理教授认为,中国对维和任务的认识与安理会的授权内容有偏差,比如,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阶段的授权目标是强制维和,但中国代表团认为是人道主义任务;还有法国绿松石行动的安理会授权为人道主义任务,但中国认为是强制维和行动。<sup>②</sup>还有学者从联合国维和机制本身变化的视角思考,认为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变化使中国对维和态度更加积极。武力使用成为中国进一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个阻碍,但2000年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使其更受中国的欢迎。2000年以后,联合国明确了不再亲自执行强制维和行动,而是授权给有能力的大国或者区域组织行动,比如,2001年由北约领导的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sup>③</sup>

## (二) 中国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责任还是利益?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逐渐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增加派

---

<sup>①</sup> 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llen Carlson, "Helping to Keep the Peace: China's Recent Stance on Sovereignty and Multilateral Intervention," *Pacific Affairs*, Vol.77, No.1, Spring 2004, pp. 18-20.

<sup>②</sup> Taylor Fravel,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ince 1989," p. 1116.

<sup>③</sup> Stefan Staehle,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Regime," MA Thesis, The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ay 21, 2006, pp. 61-82.

出人员的数量和类型,广泛参与全球不同地区的维和任务。中国为什么越来越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很大一部分学者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分析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和原因。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虽然中外学者都围绕中国的责任与利益展开,但是各持一方、有破有立。

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这是所有国内文献提到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原因的第一条。<sup>①</sup>有中国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事实,实力增长要求中国政府重新界定与之相符的国际社会身份和国际责任。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更有责任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机制,营造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环境,给世界和周边国家展现和平形象,这也是打消“中国威胁论”的有效途径。

一些学者对“负责任大国”说提出质疑,冯康云认为,“负责任大国”是一种很灵活的说法,<sup>②</sup>让中国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进行塑造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话语。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航也认为,很难衡量中国如何算是“负责任”,<sup>③</sup>决定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策略的是中国的对外与安全政策。还有一些研究者也不赞同“负责任大国”说,认为中国纯粹是为谋求自身利益而进行“维和外交”: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更有资本在联合国争取高级别岗位;或者通过派出维和保障人员,给当地人建桥修路,促进中国与当地人友好关系建立。<sup>④</sup>

① 参见牛仲君:《中国参与东帝汶维和的原因及立场分析》,《外交评论》2007年第2期,第51页;王晓因:《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意义》,《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年第6期,第52—53页;杨熙、黄立言:《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之动因分析》,《社科纵横》2007年第12期,第50—51页;张慧玉:《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中国周边维和》,《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152—155页;罗建波、蒋恒昆:《达尔富尔危机的和解进程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外交评论》2008年6月,第44—50页;赵宇:《从对外政策层面解读我国维和警务与外交互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17—24页;赵宇:《论中国民事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意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149—150页;Yin He, “China’s Changing Policy o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 50;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p. 20; 杜农一等:《新中国军事外交与国际维和研究》,第166页。

② Courtney J. Richardson, “A Responsible Power? China and the UN Peacekeeping Regime,”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No.3, June 2011, p. 286.

③ Zhou Hang, “Dragon Under the Blue Helme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Motivation for Particip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frican East-Asian Affairs*, Issue 3, September 2013, p. 46.

④ Bonny Ling, “China’s Peacekeeping Diplomacy,” *China Rights Forum*, Vol.47, No.1, 2007, pp. 47-49.

诚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能够为中国带来现实益处。首先,国内外研究普遍承认,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能提高其军队和警察的专业素质,加快军队的现代化建设。<sup>①</sup>通过派出维和人员,中国解放军有机会了解海外作战环境,增加实战经验,加强中国在海外执行非战争性军事行动的能力。<sup>②</sup>促进与友军交流和学习,<sup>③</sup>同时也是展示中国军队的能力,起到威慑作用。

其次,维和与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主要是受经济利益驱使,<sup>④</sup>不能否认,中国在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参与是有石油等资源回报的,但何银认为,这种个案的分析方式解释力有限。<sup>⑤</sup>有国外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经济(商务部)和维和(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决策程序是相互独立的,而且中国企业的经济行为早于维和干预行动,<sup>⑥</sup>“经济利益驱动说”是没有证据的。大部分学者指出,中国通过维和保护其海外利益是间接的,因为维和可以给冲突地区带去安全和稳定,进而保护当地的中国人和中国公司的安全与经济利益。<sup>⑦</sup>

再次,“一个中国”政策不再是决定维和行动的动机。有学者发现,20世纪

---

① 王晓因:《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意义》,《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年第6期,第52—53页;杨熙、黄立言:《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之动因分析》,《社科纵横》2007年第12期,第50—51页;赵宇:《论中国民事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意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149—150页;刘云:《中国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特点与意义》,《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7—13页;Yin He, “China’s Changing Policy o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 50;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p. 20; 杜农一等:《新中国军事外交与国际维和研究》,第170页。

② 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 16; 唐永胜:《中国与联合国维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第42页。

③ Courtney J. Fung, “China’s Troop Contributions to U. N. Peacekeeping,” Peace Brief, 2016, <http://www.usip.org/publications/2016/07/26/china-s-troop-contributions-un-peacekeeping>, 2017-08-01.

④ Steve Paterno, “China Interference and Influence in Sudan,” *Sudan Tribune*, March 2009, <http://www.sudantribune.com/China-interference-and-influence>, 30707, 2017-08-05; 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在中东的柔性军事存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8月,第23—25页。

⑤ Yin He, “China’s Changing Policy o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 43; 回归分析发现,2001到2010年间,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任务区与中国在当地的利益没有明显相关性,也就是说保护海外利益不是维和派遣行为的主要动机。参见 Chien-pin Li, “Norm Entrepreneur or Interest Maximise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2001—2010,”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9, No.2, 2011, pp. 313-327.

⑥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pp. 15-16.

⑦ Courtney J. Fung, “China’s Troop Contributions to U. N. Peacekeeping,” *Peace Brief*, 2016; 刘云:《中国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特点与意义》,第10页。

90年代初期,中国在维和问题上的投票结果与台湾问题有关。<sup>①</sup>不过在1998年后,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更加倾向于国际合作的角度,<sup>②</sup>尤其是2004年中国向尚未与中国建交的海地共和国派遣维和人员。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尤其是在非洲地区开展维和行动,确实压缩了台湾的国际空间,使中国在外交上可以使用更加战略性态度对待台湾问题。

最后,中国的双重身份认知决定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政策。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是社会建构的,中国有两个身份建构,即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的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行动都是参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群体的偏好进行的。比如,达尔富尔维和任务区建立之初,英美法(大国身份)有极强意愿派出维和部队,非盟(发展中国家身份)也有这样的请求。当时情况是中国与喀土穆关系很好,而且派兵进入达尔富尔地区有极高安全风险,本不想介入达尔富尔问题。但是,中国不想被孤立,所以,要同这两种身份的群体保持一致行动,中国最终说服喀土穆政府并派出进入达尔富尔地区的第一支维和工程兵部队。<sup>③</sup>

### (三) 中国在维和事业中的作用:中国贡献与中国方案

中国在联合国有双重身份,既是安理会五常之一的大国,也是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又与这些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异同。通过比较中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维和模式的独特之处。

在赵磊和高心满主编的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安理会五常国家参与联合国维和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五常国家参与联合国维和的情况各不同:美国维和政策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借重联合国推行自身利益,一旦联合国不按其旨意,美国想尽办法将其边缘化,尤其在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阶段

---

<sup>①</sup> 中国在1996年对联合国海地支助团的延期问题上威胁使用否决票,1997年否决在危地马拉建立维和任务的草案,1999年否决联合国马其顿预防性部署延期,普遍认为中国行使否决票是因为当时的维和对象国与台湾建交。参见 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 13.

<sup>②</sup> 毛瑞鹏:《主权原则与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议案中的投票行为(1994—2004)》,《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55—60页。

<sup>③</sup> Courtney J. Fung, "What Explains China's Deployment to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6, 2016, pp. 409-441.

后,派出极少,主要是以后勤和情报人员为主的非作战部队;英国出兵率也很低,但在非联合国指挥的多国部队出兵积极;法国比较重视联合国的行动,派出人员主要在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的中东地区(如黎巴嫩),而且在秘书处的维和部门把控要职;俄罗斯保持超脱的态度,派遣人员和提供资金都很少;<sup>①</sup>而中国是五常里面派兵人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第二大出资国。

意大利特伦托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丹妮拉·斯科利(Daniela Sicurelli)系统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参与维和的不同之处。西方国家进行的维和行动一般都不在联合国框架下。比如,欧盟框架下的非洲维和行动就不受联合国领导,欧盟提倡共享主权和良治政府的规范,欧盟出资,采取欧盟—非盟—非洲区域组织合作这种“共享主权”的方式,通过建立非盟常备军、军事能力培训中心、预警系统等策略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尊重国家主权,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不附带政治条件原则。结果显示,中国在非洲比欧洲更受到非洲领导人的欢迎。<sup>②</sup>柏林自由大学亚洲问题研究员加利玛·莫汉(Garima Mohan)等学者发现,中国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维和理念一样,尊重主权原则,重视当事国的意愿。他们是维和出兵大国,派出较大规模的安全部队和战斗部队,比如印度、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加纳等,而且一般参与联合国授权的维和任务。不过,这些国家的维和人员在维和行动决策层和任务区担任指挥官的情况较少。<sup>③</sup>

中外学者大多认为,中国对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具体说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人力、财力和政治上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强其行动有效性。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数量上出现大幅增长,联合国对维和人力和物力上的需求很大。从1990年开始,中国相继派出军事观察员、工程和医疗等支援部队、安全部队,累计派出3.5万多人,修复道路长达1.3万公里、桥

---

① 赵磊:《世界主要国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比较研究》,载赵磊等主编:《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前沿问题》,第154—221页。

② Daniela Sicurelli, “Competing Models of Peacekeeping: The Role of the EU and China in Africa,” Paper for the Fifth Pan-European Conference on EU Policies in Portugal, June 23-26th, 2010.

③ Garima Mohan and Olivia Gippner, “Chinese and Indian Approaches to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 Theoretical Appraisal of Contribution Patterns and Decision-making Structures,”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Law and Social Justice*, Vol.7, No.1, pp.83-111.

梁 300 多座、运输 120 万吨物资超过 1300 公里、救助 16 万伤病人员；<sup>①</sup>中国维和官兵素来准备充分、专业素养过硬、纪律性强，他们对维和任务成功起到重要作用。在财政支持上，中国也越来越积极，缴纳维和摊款的比例达到 10.2%；2016 年，中国建立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用于支持维和相关事业。

除物质上的支持外，中国还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宝贵的政治支持，利用与冲突地区部分政府的特别关系使其同意接受维和行动。<sup>②</sup> 在达尔富尔维和任务建立之前，中国政府通过与当地各方力量的沟通、协商，说服苏丹政府让维和人员进入。中国鼓励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慎用强制和武力的形式。征得当事国同意，让维和行动具有合法性，让维和任务更具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第二，中国的积极参与加强了联合国的合法性，巩固联合国在国际维和中的核心地位。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副教授张逸潇认为，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阶段维和任务的失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减少了向联合国派员，而更愿意以区域组织或联盟的形式开展“和平行动”，比如，北约、欧盟在科索沃、波黑、阿富汗等地的行动。<sup>③</sup>冯康云认为，中国历来只参加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不参加其他区域组织或者同盟。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维和行动的积极态度表明对联合国这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尊重，意在倡导在联合国框架内平等协商、管理冲突，反对任何国家采取单方面行动，侵犯他国主权。<sup>④</sup>

第三，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经验形成的新规范和新范式冲击了联合国建和框架。近些年，有学者开始立足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提出以发展优先的建设和平新规范。何银认为，当下的联合国建设和平框架是基于“自由和

---

① 参见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resources/statistics/contributors>, 2017-08-22。

② Jonathan Holslag, “China’s Diplomatic Manoeuvring on the Question of Darfu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7, No.54, February 2008, pp. 71-84; 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③ 张逸潇：《大国政治意愿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武警学院学报》2015 年 11 月第 11 期，第 26—29 页。

④ Courtney J. Fung, “What Explains China’s Deployment to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 413.

平”的理念,<sup>①</sup>通过改革政治体制、组织选举、恢复法律等建立制度的方式,实现解决冲突、建立可持续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自由和平”下的建设和平任务参与很有限,<sup>②</sup>但是,在联合国建和框架外,对非洲冲突后重建等建设和平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一种“发展和平”的新规范。<sup>③</sup>近几年来,有更多学者参与对“发展和平”的讨论。例如,浙江师范大学副研究员王学军、南非国际问题研究院项目主任克瑞斯·艾登等学者,探讨中国的“发展和平”在非洲建设和平中的实践。这种以发展为优先的建和范式有两个特点:一是以经济建设为首要目标。在冲突后重建地区,应该首先践行经济发展,满足当地人基本需求,包括提供住房、食品、基础设施等;二是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强调发挥当事国的自主权,也注重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主导力。<sup>④</sup>一些学者认为,在“发展和平”规范的影响下,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也具有“发展型”特色。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薛磊认为,中国派出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在海外进行建桥、修路、排雷、医护等工作,带有支持当地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色彩,形成“发展型”的维和参与。<sup>⑤</sup>随着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主张的“发展和平”模式可能对联合国建和框架产生更多的影响,这增强了中国在维和领域的话语权。

---

① 有关“自由和平”的表述和批判参见:Roland Paris, *At War's End: Building Peace after Civi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Ian Taylor, “What Fit for the Liberal Peace in Africa?” *Global Society*, Vol.21, No.4, October 2007, pp. 553-566; Oliver Richmond and Jason Franks, *Liberal Peace Transitions: Between Statebuilding and Peacebuilding*,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Roger Mac Ginty and Oliver Richmond, *The Liberal Peace and Post-War Reconstruction: Myth or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9.

② Lei Zhao, “Two Pillars of China’s Global Peace Engagement Strategy: UN Peacekeeping and 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18, No.3 June 2011, pp. 344-362.

③ “发展和平”的概念由何银副教授于2013年首次提出,作为一种不同于“自由和平”的规范展开讨论的。参见何银:《中国崛起与国际规范体系: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例》,《新战略研究》2013年第3期,第29—44页;何银:《联合国建设和平与人的安全保护》,《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3期,第75—91页;何银:《规范竞争与互补:以建设和平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105—121页。

④ 参见何银:《规范竞争与互补:以建设和平为例》,第115页;〔英〕克里斯·奥尔登等:《非洲冲突后重建:中国日益增长的作用》,《国际展望》2011年第6期;〔南非〕克瑞斯·艾登、〔英〕丹·拉吉:《中国对非洲和平与安全政策的演进:一种建设和平的新范式?》,《非洲研究》2013年第1期;Xuejun Wang, “Developmental Peace: Understanding China’s Africa Policy in Peace and Security,” in Chris Alden, et al., *China and Africa: Building Peac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on the Contin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 90-118.

⑤ Lei Xue, “China’s Development-Oriented Peacekeeping Strategy in Africa” in Chris Alden, et al., *China and Africa: Building Peac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on the Contin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 119-121.

### 三、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时间不到 30 年,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也是最近十几年才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国内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军警系统的附属研究所,如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国防科技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也有高校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力量,而国外研究者主要是大学教授或者智库研究员。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文,也有一些英文文章翻译刊载在中文期刊。从研究视角上看,军警系统背景的研究者更倾向提出政策建议;高校研究者更多用理论框架解释一些问题,比如,关于外国学者对中国官方说法提出的质疑,他们会集中探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是不是因为做“负责任大国”的问题上。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逐渐从一个国际规范的“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和“供应者”的角色发展。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议题上,也能看到这样的转变。过去的研究侧重解释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及态度变化的原因,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文章在讲中国的维和方案、中国的“发展和平”规范。国内外学者都注意到“发展促和平”的议题,但如何将“发展和平”进一步理论化,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尤其当下是联合国和平行动改革的新阶段,联合国也期待中国在维和建和领域提出新理念和新思路。

基于对中国维和实践和理念的进一步完善,更加宏大的目标是形成独立的“中国维和学”。从学科建立角度看,维和研究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法、国际组织、军事学等内容,因此,需要运用跨学科的知识 and 理论进行研究。研究者需要运用上述学科的知识 and 理论对预防性外交、建设和平、人道主义干预、平民保护、冲突管理等问题进行基础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研究框架和范式,并以此指导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的实践,也为中国创新不干涉原则寻找突破口。从维和战略角度看,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既涉及国防和军事,也关系到外交和战略。目前,主要由国防和军事部门负责管理和协调我国参与联

联合国维和,但是,还需要把维和作为我国多边外交和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要在综合分析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地缘政治、国际环境、多边外交等基础上形成中国的参与战略。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中国外交特别是联合国外交的转型、建设性和引领性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和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等方面,对战略选择进行前瞻性和开拓性的研究。

另外,有一项基础工作值得重视,即客观详细地梳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纵观国际维和学科的发展脉络,早期的研究注重详尽、准确地描述每个维和行动从创建到落实的整个过程,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sup>①</sup>目前尚缺乏全面介绍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的著述,尤其是对中国2000年以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梳理。维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研究领域,大部分研究者很难获得一手材料,主要依靠官方文件或媒体报道。如果能够客观、细致地呈现历史故事,对于后续研究是一笔宝贵财富。

另一个未来研究重点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层面。根据笔者对国防部维和中心官员和维和问题研究专家的访谈了解,维和实操人员和学界都认为有必要且急需研究维和行动中操作性的具体问题,比如,对维和行动如何部署、如何开展、如何培训等。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威胁,如何保障本国维和人员安全是一个重要话题。2014年,中国派出成建制的维和步兵营,探讨维和步兵营在维和行动中的应用,对中国维和实践很有价值。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充分发挥军警院校的优势,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负责对维和人员进行派出前的培训,许多任教老师都有维和经验,并与前方维和人员有密切联系,他们的研究和政策建议将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有启发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通过梳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程,可以发现大部分研究多为历史叙述,缺少理论框架。<sup>②</sup>国内研究多为“叙述—归纳”和“分

---

<sup>①</sup> Virginia Page Fortna and Lise Morje Howard, "Pitfalls and Prospects in the Peacekeeping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1, 2008, pp. 283-301.

<sup>②</sup> Courtney J. Fung, "What Explains China's Deployment to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 410.

析一展望”，<sup>①</sup>有极少定量方法的文章。<sup>②</sup>国外研究有两方面值得借鉴：一是使用过程追踪方法(Process Tracing Method)，具体分析某个维和案例，分析很深入。比如，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广野美和(Miwa Hirono)在《在当地民众中建立信任：维和中的公正性原则》一文中，<sup>③</sup>追踪中国早期支持柬埔寨红色高棉及后来支持西哈努克的政策变化，认为中国形成的“双重外交政策”使当地人认可中国参与联合国驻柬埔寨维和行动的公正性；另一个是国外研究过程中加入很多访谈，比如，在国际危机组织<sup>④</sup>的报告里涉及大量对联合国及中国维和一线人员的访谈，冯康云的文章里也是基于很多这样的采访完成的。适当的访谈不仅可以拓宽研究者的研究思路，还可以增强解释力。

在交流合作上，应该增加研究者与维和实务人员的沟通。国内方面，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偏向政策研究，但研究中的预测似乎与国内维和政策决策相差较远。比如，2002年，有学者预测“中国将可能更重视周边地区维和行动，对安全与稳定的作用较多体现在地区范围”，<sup>⑤</sup>但在第二年，中国就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也就是非洲派出维和部队；再比如，2011年，有学者认为，“中国短时间不应该大规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sup>⑥</sup>而在2013年中国就突破性地向马里特派团派出安全部队。很明显，国内维和政策已经走在学术预测前面，因此，应该加强政学沟通。在国际方面，学者应该多与联合国维和机构交流，贡献中国智慧。比如，李东燕等学者参加公谊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组织的考察团，到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维和任务区考察，<sup>⑦</sup>后到纽约联合国总部与维和官员进行交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大审议报告也需要中国的声音，中国对维和机制的创新也需要学界的

① 郑启荣：《联合国研究在中国：回顾与思考》，《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21页。

② Zhou Hang, “Dragon Under the Blue Helme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Motivation for Particip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Chien-pin Li, “Norm Entrepreneur or Interest Maximise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2001—2010.”

③ [日]广野美和：《在当地民众中建立信任：维和中的公正性原则》，载赵磊等主编：《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前沿问题》，第488—512页。

④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China’s Growing Role in UN Peacekeeping.”

⑤ 唐永胜：《中国与联合国维和》，第44页。

⑥ 王乐丰：《论中国大规模参与联合国维和的危机》，《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123页。

⑦ 李东燕：《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前景与路径》，《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3页。

努力。

随着中国逐渐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对维和投入更大的支持,相关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既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机制,也让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和平理念。由此看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任重而道远。